

一段以文革为背景的童年往事，一个少女青涩无知的错误，尘封多年的悔愧，终于使她走上了漫漫救赎之路，并以海外归人的身份，印证了中国感觉。作者以反省的立场和深厚的笔力，呈现历史和人性的多义，发掘思想深处的壮美，引领道德和灵魂的上升。

小说月报
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小說月報

梁曉聲

生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生非 / 梁晓声著. 一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5

(小说月报原创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306-5913-7

I. ①生…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934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4 字数 160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16.00 元

天气是难得地好，陶姫女士的心情却烂透了——丈夫因“流氓行为”被镇派出所拘押了两个多小时；最终在她的强力交涉下，交了1000元罚款才解除拘押。

“你怎么可以给钱？！”

丈夫沃克·奥尼尔一获得自由便对她大光其火；而她一言没发，甩了丈夫一记耳光。

丈夫一只手揉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呆瞪着她，像受委屈的孩子，几乎要哭了。尽管他外国人特征鲜明，一只手却还是被铐在了派出所的护窗铁条上——南方的派出所通常是将待审的人铐那儿的。幸而陶姫交涉的及时，否则“待”多久是难说的。

两千多户人家的小镇，传达暗号似的，迅速就将她丈夫那一件丢人现眼的事传播开来。自然的，使她也成了一个狼狈的女人。从派出所往旅店走的路上，他俩身后始终跟着些看热闹的人，像走在荒野的两口子后边紧跟一群狼，一直跟到旅店门口。等他俩出来，他们仍守候未去。又跟着，直跟到他俩上了一辆小面包车为止……

只能坐六个人的小面包车已然超载，他俩在门口是犹豫了一下。

“上啊上啊，下辆车也会这么挤的！今天是集日，哪有不挤的车？……”

招揽乘客并且卖票的人，一边说一边将他俩推上了车。之后，自己便上了车，理所当然地坐在司机旁的空座上。陶姫的老外丈夫，立刻聚焦了全车人的目光，包括一个抱在母亲怀中的两三岁孩子的目光。她先被推上车的，吸入一口污浊的空气，本能

地朝车门转过身，双手撑于门上方。尚在车下的沃克，见状更加犹豫。他张张嘴，分明想要说句什么，大概想说“那你下来吧”；不待他那话说出口，也被卖票的推上了车。车门一关，车内的空气更加污浊。没在集上卖掉鸡的一个农妇，将两只双爪捆在一起的公鸡带上了车；而一个四十多岁的精瘦黢黑的小个汉子，膝上则横着扎口的麻袋，听里边发出的声音，显然是一头小猪。沃克不得不弯曲他那一米八的身体，即使那样，后脑脖子以及双肩，还是与车顶紧贴着了。他用屁股顶着车门，双脚蹬着车门口那一级台阶，为了保持平衡，搂住陶姐的腰。陶姐不太情愿，却无可奈何，因为再没有一点儿空间能将丈夫推开一些。丈夫的长下巴抵在她的肩部，而她倒宁愿和他脸对脸。不论对于她还是丈夫，脸对脸的别扭也强过那样。

车一开，空气总算不那么窒人了。

沃克的唇触着了她的耳廓，他小声说：“我没做那种事。”

“别说了！”——陶姐心里的火气腾地又蹿上脑门，语调听起来就挺严厉。

沃克执拗地说：“我明明是上了一个圈套，你怎么就不肯相信我，而非相信他们不可呢？”

听来，沃克也有点儿火了。

“我非相信他们了吗？你暂时闭上嘴行不行啊？！”

陶姐嚷嚷了起来。

一时间，车上所有人的目光又都望向他俩了，连卖票的人也回过头来，连司机也说：“不许再吵啊，看吓着孩子”，连麻袋里那只猪崽也停止了哼哼。

沃克咒骂了一句：“他妈的！”

之后，小面包车劣质的收音机里传出嘶嘶啦啦的歌声：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再之后，不知是开车的还是卖票的换了频道，收音机里又传出了相声。于是，车厢里有人笑了。相声延续了几分钟，车厢里也就笑声不断。至于那段相声究竟说了些什么，陶姍的耳朵是一句也没听进去的。她只听到了笑声，别人们的笑声，对于她不啻于火上浇油……

陶姍当然是一位中国女性，不，应该说曾是一位中国女性；自从二十几年前嫁给沃克，便是一位美国公民了。目前，她是美国某州立大学的教授，教中国古典诗词。同时，还是那一州由中国政府开办的孔子学院的客座教授，每周两节课。第一节课用英语讲，第二节课用汉语讲。沃克是同一所大学的教授，教比较文学，热爱摄影，摄影作品曾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过，算得上是一位业余摄影家了。

以前，只要陶姍想回中国，沃克总是表示乐于伴她成行。他不但爱他的中国妻子，渐渐地也开始爱中国了。每一次准备陪妻子回中国，都显得有些兴奋。六年前，陶姍的父亲去世了。四年前，她母亲去世了。陶姍的父亲曾是一位大学校长，而母亲曾是省城的中学校长。父母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他们先后去世，她在国内便没亲人了，故而回国的动念起得不怎么热切了。

一种现象相当普遍，不论哪一个国家的人，即使早已成了外国人，对于回到或打算回到原属国这一件事，习惯上往往还是要说成“回国”的。仿佛对于他或她，原属国才更是自己的“国”。这与是否喜欢或热爱后来加入国籍的那一国其实没什么必然关系，与是否融入到了那一国家的主流社会也没什么必然关系。必然的原因只有一个，便是——人性更倾向于维系住对自己来

他为什么要把‘冷嘲热讽’四个字加在我头上呢？……”

那一天是周六，陶姐做完家务，正和丈夫在花园里闲适地饮着上午茶。一个国际长途听下来，使她的情绪大为激动。

大学时期曾经要好得如同死党的乔雅娟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劝她：“陶姐啊，你也不要太生气，而且你还要理解他一点儿。我想，他那么做，恐怕也是迫不得已……”

“我实难理解！迫不得已？总不会是因为有人持刀逼着他那么做的吧？”

陶姐起身离开小桌，绕到了房舍后边，她不愿丈夫听到她的话。

“当然绝不会有什人逼他那么做。可他毕竟是一位官员啊！不论当的什么官，身在官场，那也就是在政治场。我猜他是这么想的，自己如果不那么做，万一有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那么做了，倘若自己被追问到头上，不是会很被动嘛！他也不过就是出于防一手的心理，变被动为主动。他那人你也是了解的，一向谨小慎微。当了那么一个半大不小的官儿以后，更加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了。怎么说他呢，特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何况，你上次回国，不是正赶上中美关系闹得挺紧张的嘛！非常时期，你和他都是非常身份，他的做法确实超明智了，但怎么说也是你应该予以原谅的。啊对了，我还得提醒你一下，以后要在中美关系好了的时候回国来，别偏偏赶上中美关系挺紧张的时候……”

她没耐性听下去，找个借口，说声“拜拜”，啪地合上了手机。回到前院，立刻冲丈夫发起火来：“你们美国政府为什么总和中国政府过不去？！……”

坐在椅子上的丈夫放下报纸，定睛看了她片刻，慢条斯理地说：“姐，别忘了你早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了！你和我一样，都是美国公民。”

她呢，则有问必答，告知周详。

最后他语调温柔地问：“陶姐啊，你任教那一所大学也是一所不错的大学对吧？”

她说：“是的。”立刻就猜到他下一句要说什么话了。

果然，他紧接着说：“那，如果我儿子想进那所大学，你能帮上些忙吗？”

“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她回答得有些迟疑。

对方却步步紧逼：“有你这句话太好了！那我就决定了，干脆让我儿子进你们那所大学！他到了那儿，你还会像关心自己儿子一样关心他，对不对陶姐？”

连她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顺口说出了一个“对”字。

“陶姐，你回答的这么痛快，真让我感动！那，咱们一言为定啰？喂，喂，能听清楚吗？”

“能。”

“一言为定？”

“可是，我只承诺尽力而为，至于结果如何……”

“你尽力而为还不就等于板上钉钉了嘛！你在你们那所大学当了十几年教授，你先生当教授的时间比你还长，有你们两位教授鼎力相助，我儿子的事儿再难那还能难到哪儿去呀？我放心了，一百个放心啦！人情后补，等你什么时候又回国了补……”

放下电话后，陶姐骂了一句：“浑蛋！”

丈夫问：“你为什么骂人家？”

她说：“我才不愿帮他！”

“那你还说尽力而为？”

“我不得不那么说！大学时期他追求过我，我俩谈了一年多的恋爱，不那么说你让我怎么说？”

“就是那个出卖了你的人？”
“不错。是他！”
“你本来完全可以拒绝的。”
“我不愿让他猜到他的所作所为我已经知道了。”
“那你不是……使自己陷入了虚伪的境地？”
“那又怎么样？说了尽力而为我也可以不为！”
“可虚伪，总是不好的吧？”
“人有时候那就不能不虚伪一下！”
“你们中国人不是主张‘君子坦荡荡’吗？”
“可我现在已经是美国人了！”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使你变得虚伪啰？”
“美国就是专使人变成君子的君子国了吗？你们美国人就没有虚伪的时候了吗？”

“咱们美国！”——沃克有点儿生气了。

“那你也应该说咱们中国！”——陶姐提高了嗓门儿。

因为丈夫比自己大八岁，因为他看去比实际年龄老；也因为自己虽然也已经 48 岁了，但形象好，皮肤好，脸上几乎仍没皱纹，所以在他们夫妻之间，在她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她往往会显得有那么点儿霸气。当然，说到底，是他将她惯的。自从结为夫妻以后，大她八岁的美国佬是那么的乐于处处让着她。自从他开始秃顶了，则不但处处让着她，而且更加惯着她那种特权性质的霸气了。

丈夫那一天晚上似乎要认认真真地和她抬一次杠，他故意板着脸说：“我不能那么说。我那么说不符合事实，因为我从来不曾是过中国人。”

“但你是中国的女婿！”

丈夫也被噎得直眨巴眼睛说不出话来。

“你说你说！你已经是中国的女婿了，中国还不是咱们的中国吗？”——陶姪得理不让人，不躺着了，在床上盘腿一坐，一副不争出个谁是谁非绝不罢休的样子。

丈夫只得耸耸肩，苦笑着嘟囔：“我从来也没敢把自己当成中国的姑爷，我认为我只不过是你爸妈的姑爷。人贵有自知之明，不可以得寸进尺。”

“姑爷”二字，使陶姪扑哧笑了。

她一笑，丈夫便将她拖倒，拽入被窝，搂在了怀里。

他又说：“我们好久没抬杠了。”

她说：“是啊。”

他接着说：“其实两口子之间抬杠玩儿，挺来劲儿的，也挺过瘾的是不是？”

她就什么也不再说，吻了他一下，背过身去。沃克喜欢从她身后搂着她睡。她也早已习惯了被丈夫那么搂着睡，觉得很舒服。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虽然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可谓老夫老妻也，但那份相互间的恩爱却一如当年。性生活也一如当年那么有质量，仍能令彼此获得心满意足的享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女儿在三岁时患病夭折，都不觉得生活有什么遗憾。经那一次打击之后，他们决定不再要孩子了。可是近来，丈夫却时而谈起有一个孩子的好处……

陶姪叹了口气。

丈夫便开始爱抚她，他认为她又想起他们的女儿了。

她心里想的竟不是女儿，低声问：“亲爱的，你觉得会不会是别一种情况？”

他困惑地反问：“什么事？”

她寻思着说：“就是我被出卖了那一件事。”

他不得不又问：“哪一种情况？”

“如果出卖我的不是李辰刚呢？恰恰相反，是当年在大学时期和我最要好的乔雅娟呢？比如她自己出于往上爬的目的，于是抓住一个机会想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结果就做了那种可恶的事。明明是她干的，却又怕别人猜到了是她，先告诉我，就主动给我打电话，把她自己干的卑鄙勾当说成是别人干的？……”

丈夫沉默片刻，在她肩头轻轻吻了一下，之后温柔地说：“睡吧，别想那件破事了。”

一个外国男人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且与之恩恩爱爱的生活了二十余年的话，附带的好处是，他说起中国话来和一个中国人那就毫无区别了，甚至连语调也会变得地地道道地中国味了——起码地地道道的中国老婆味。

她却又向丈夫转过身去，固执地说：“不，我要听听你的看法。否则我心里会总寻思那件事，想睡也睡不着。”

“非要听听我的看法不可？”

“对。非要听。”

“可你刚才还说，在大学时期乔雅娟和你最要好。我记得你对我提起过她多次，曾经形容她是你大学时期的死党。”

“事实正是那样。”

“后来她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

“没有。”

“别人对她的人品有什么负面评价吗？”

“也没有。”

“那么，你根据什么把她想得很复杂呢？”

“因为，人有时候就是那么的复杂。”

“是啊，亲爱的，人有时候的确是复杂的。但我认为，关键是不要使自己也变得复杂起来。你看你，你明明并不打算帮李辰刚什么忙，却要在电话里对他承诺尽力而为，结果使自己显得挺虚

伪。这会儿，你又无端地把乔雅娟猜测得很卑鄙，结果不是又使自己显得不够厚道了吗？对于她告知你的事，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不信。信不信都没什么，但你把她想得很卑鄙，那就连我，你的丈夫，也要替她鸣不平了。这就是我的看法……”

电话忽然又响了。

陶姮犹豫一下，第二次抓起电话，这一次却是乔雅娟打来的，使她大出所料。

“嗨，陶姮，没睡吧？”

乔雅娟的话听来急急切切的。

“已经躺下了。”

陶姮的回答得淡淡的。

“你怎么了？”

“没怎么啊。”

“声音蔫蔫的。”

“感冒了，还发着烧呢。”

“那我不跟你多聊了，简单地说，李辰刚那家伙给你打电话了？”

“你怎么知道？”

“他刚刚也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对我说了一大堆感谢你的话。我猜，是希望通过我的嘴把他那一大堆话转告给你。凭咱俩的关系，傻瓜也会估计到这一点的！可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我明明告诉你了，他对你，对我们几个当年的同学做了什么勾当，你干嘛还大包大揽地答应帮助他儿子的事？……”

陶姮一时嘴对着话筒哑口无言，不知说什么好。

“不信我的话是吧？”

分明，乔雅娟的情绪甚为不快。

陶姮愣了愣，慢悠悠地说：“雅娟呀，我不是感冒着嘛，困死

了，美国的一种感冒药有安眠的作用……”

乔雅娟沉默了。

陶姍补充道：“真的。”

乔雅娟终于又开口了：“你认为我骗你？”

陶姍便也沉默了，更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那，你睡吧，算我自讨没趣！”

乔雅娟将电话挂了，陶姍握着话筒发愣。

不知何时，丈夫已下了床。他站在床边，一手持杯，一手伸向她，掌心托着小小的一片安眠药。他经常失眠，安眠药是家中的必备药。

她疑问地看着丈夫。

他不无同情地说：“要不你更睡不着了。”

她默默放下电话，接过水杯和药片，乖孩子似的服了下去。丈夫替她将杯放在床头柜上，她立刻仰躺下去，闭上了眼睛。

丈夫随之也上了床，关了灯。她一翻身，又背对着丈夫，并且主动向丈夫偎靠过去。丈夫也就又从她身后搂着她，爱抚着她。

黑暗中，陶姍说：“乔雅娟不信我感冒了。”

丈夫说：“你本来就是在撒谎。”

也许是为了抵消掉一部分自己的话的批评意味，他又吻了她的肩头一下。

她温柔地问：“你还想吗？”

丈夫不明白地反问：“想什么？”

她扑哧笑出了声，莫测高深地说：“真不明白就当我没问好了，睡吧。”

不料丈夫将她的身子一扳，使她脸朝着他了，追问：“不行，你得把话说明白，要不我也肯定失眠了！”

她就捧住他的脸，给了他一个深情的吻，语调中满是歉意地

母亲说：“那样，就等于我们这个家族为延续基督教的神圣影响作出了一份贡献。只有你的妻子也是基督教信徒，将来你们的孩子才能也是。”

他父亲还郑重声明——如果陶姫不打算皈依基督教的话，做父母的也就绝不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而且，在他们婚后，父母不便和他们来往。

于是双方陷入了僵持。

为了爱情，陶姫表示，她完全可以对基督教采取一种信奉的态度，但请求允许她暂不施洗，姑且先做一名教外信徒。实际上，她当年所言的“一种信奉的态度”，指的是对基督教文化的兴趣而已。她不仅对基督教文化有兴趣，对佛教文化也有兴趣。

当年她曾对沃克说：“你干脆这么对你父亲讲，我来到美国之前，在中国已经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了。基督教和佛教的教义，有许多方面是相一致的。既然如此，我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和是一名基督徒不也没什么两样嘛！”

“你……真是佛教徒？你可从没对我说起过……”

沃克当时呆呆地瞪着她，仿佛忽然不认识她了。

她调皮地一笑，说别当真，我不是佛教徒，不就是为了咱俩能顺利地结成婚嘛，你就那么骗骗你父母不行吗？

沃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当然不行。说他宁愿父母不参加他们的婚礼，也不愿用她的话骗自己的父母。还说，幸亏她并不是真的是一名佛教徒，要是，他俩的婚事将更不顺利了。不但他的父母会坚决反对，他的全体家族成员，也将会向罪于他的。这并不表示基督教徒们容不得佛教的存在，事实上在诸教派中，基督教徒们最为尊重的反而是东方的佛教。但尊重是一回事，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男人娶一个是佛教徒的女人为妻，便是另一回事。在同一个家庭里，倘若既挂耶稣圣像，摆着《圣经》，又设佛龛，同样

—

两个月后的这一次回国，却是陶姮首先向丈夫提出的。丈夫惊讶得瞠目结舌，她就娓娓道来地向丈夫讲了一件事情。丈夫听罢，当即表态：“是应该回去。早就应该专为那件事回去一次了！”

于是第二天，夫妻双向大学请假。丈夫预料，批假不会那么顺利，她也想到了这一点，将请假事由写在了纸上，结果顺利得不能再顺利。正如中国话所说——一路绿灯。

陶姮的请假书，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份请假书。三千余字，亲笔用秀丽清新的英文写的……

那是一件三十五年前的事。确切地说，是一九七五年的一件事。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时期，而陶姮才十三岁。那一年她的父母已从中国的“教育战线”被“扫地出门”八年多了。“文革”伊始，她的父母就因为是“黑线人物”被打入了另册，八年中不断转移劳改地，最终被遣送回了她母亲的原籍。一般来说，对于是夫妻的“黑线人物”，往原籍遣送那也首先考虑往男方的原籍遣送。但她父亲出生在香港，便只有将他们夫妻往女方的原籍遣送。父母往哪儿去，自己跟向哪儿，对于十三岁的陶姮，没有另外任何一种选择。起先是父母轮番抱着她背着她转移劳改地，年复一年，后来自己渐渐就能跟着父母走了。也可以说，从她五六岁的时候起，差不多便等同于一个小劳改犯了。当年她父亲的罪名是“特嫌”，在所谓“黑帮”分子中，尤其是万劫不复的罪名，甚至在“另册”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走资派”是在“路线斗争”中站错了队，还有经过批斗和改造，重新站回到“红线”的可能；“右派分子”还有熬到“摘帽”那一天的盼头；曾经的地主富农，只要对无产阶级专政表示彻底的敬畏，不乱说乱动，也只不过就是被视为

的事分心。她明明将学费交给他了，那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有三名同学看见了。他们都是和她友好的同学，她相信他们肯定会作证的。再说他们也不太喜欢陶老师，因为他平时对学生的要求太严格。但她也没怎么用心听课，在别人家孩子才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父亲就已经将初一至初三的化学常识基本上对她讲过了。父亲曾是大学里的化学教授，比这一所中学的化学老师讲得有趣多了。她只不过背着手端端正正地坐着，想自己一家以后的命运可能还会糟到什么地步。想到伤心处，眼眶一湿，伏在了桌上。

不料下课后，守在教室门边的陶老师叫住了她，阴沉着脸让她跟他到教研室去一下。师生二人进入教研室，已有四位下课了的老师也回到教研室了。有的在喝茶，有的在看报。

陶老师坐下后，对肃立在自己跟前的陶姮说：“我又对着登记册统计了一下钱数，还是少你们九名同学的学费和书杂费。不错，昨天上午我是在校门口碰到了你，但你只问我如果你不买课本行不行？我当时的回答是，‘没有课本你怎么能在学校里学习呢？’是这样吧？但是之后你绝对没给我什么用手绢包着的钱……”

“我绝对给了！”——陶姮大叫起来。

陶老师愣了愣，也提高了声音：“老师是不会记错的！”

“我也是不会记错的！有同学可以为我作证！……”

陶姮的声音都发尖了。先进入教研室的，刚进入教研室的，每一位老师的目光都望向了她和陶老师。

陶老师就愣得发呆，良久说不出话来。

陶姮哭了。不但觉得委屈，而且认为清白无端地受到了怀疑，人格也受到了严重侮辱。

“凭什么你说你是不会记错的，我就非得承认是我记错了！”

我有证人可以证明我当时把钱交给了你，你有证人证明我当时没把钱交给你吗？我明明把钱交给你了，你当老师的还朝我要，你就是成心欺负学生！今天我把话说清楚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把我逼得没法了，我就死在你家门口给全校的学生和老师看！给全村人看！我如果被你逼死了，即使我父母无法替我申冤，老天爷有眼，他也饶不了你的！……”

陶姐宣泄着大喊大叫，愤怒地挥动手臂，轮番跺着双脚。长期的屈辱，长期的压抑，不，是长期的被压迫感，在那一时刻，全面地、总体地、骤然地爆发了！就像通常所形容的，“火山喷发了！”——也可以这么说，十三岁的少女，当时歇斯底里大发作了！她叫喊。后来，一屁股坐在地上，蹬踹双脚号啕大哭。

那意味着是她对自己和父母以往所遭受的一切一切迫害的表现猛烈的总抗议。当然，也是第一次抗议。十三岁之前，她连那样的意识那样的勇气也丝毫没有。

陶老师半张着嘴，双眼瞪得大大地看着她，惊骇的表情僵在脸上，身子也仿佛被浇铸在椅子上，动弹不得了似的。他脸上那一大片紫痣，紫得发黑了，如同老茄子的颜色了。

一位女老师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走到陶姐跟前，将她拽起，拉扯到了门外。

门关上后，她小声对陶姐说：“别哭了，回家去。起码我听明白了，没你什么责任。有些公道，到时候还是会有些人愿意出面主持一下的……”

女老师的话，使陶姐内心里那巨大的难以控制的宣泄情绪，总算平缓了一下。她走在回家的路上时，用各种解恨的话语，在心里将陶老师诅咒了一遍又一遍。

进了家门，父母还没回家。据父母说，他们这几天跟村里的些个“专政对象”在砍茶秧。当然的，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之下。村